

动物法律权利理论:简单和基本的权利*

[德]萨斯基亚·斯塔基** 著 马亮*** 谢咏**** 译

摘要 随着动物法律权利的兴起,将动物权利系统化、理论化地纳入法律权利是有必要的。本文探讨了三个与动物法律权利性质和基础有关的概念性、理论性和规范性问题:动物是否、能否、应否享有法律权利?这将证明动物成为权利主体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除此之外,“动物福利权”是从现有的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尽管目前这些法律权利是不完善和弱小的。另外,本文引入了“简单和基本的动物权利”一词,以区分动物在实证法中所享有的弱小法律权利与在未来法律中应当享有的强大法律权利。

关键词 动物法律权利简单和基本的动物权利 权利理论 动物福利法

一、引言:引入动物法律权利理论的必要性

动物法律权利的出现,需要相关法律理论的支持,即动物法律权利理论。

* 原文载2020年《牛津法律研究杂志》(*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已经获得作者授权。本文是作者博士后研究项目“动物权利法律理论三部曲”的第一部分,该项目由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特此感谢 William Edmundson, Raffael Fasel, Chris Green, Christoph Krenn, Visa Kurki, Will Kymlicka, Nico Müller, Anne Peters, Kristen Stilt, MH Tse, Steven White, Derek Williams 以及《牛津法律研究杂志》的匿名审稿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考虑到本文的翻译性质,译文保留了原文脚注的基本内容及形式。

** 原文作者萨斯基亚·斯塔基(Saskia Stucki)博士系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海德堡)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法学院动物法律与政策项目访问研究员。

*** 马亮,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 谢咏,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尽管学界存在各种各样与动物权利相关的道德和政治理论^[1],但对动物法律权利性质和概念基础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目前,与动物权利相关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少,且较为零散。^[2]大多数法律文书都是以模糊的、基本的、无差别的动物权利概念为基础,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以动物道德权利为依据,掩盖了动物法律权利独特的性质和特征。^[3]我们需要将动物法律权利进行系统、细致地理论化,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动物权利逐渐转向法律权利;其二,动物法律权利的兴起。

1. 虽然动物权利最初被定义为道德权利,但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潜在的法律权利。换言之,动物的道德权利是在一种“应为法律权利”的意义(或“宣言意义”^[4])上主张的,它要求法律制度化,即动物在理想状态下应当享有的法律权利。^[5]将动物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纯粹的道德权利(独立且先于法律效力之前)不能为动物提供充分的实质性保护,而法

[1] Seminally,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Sue Donaldson and Will Kymlicka,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OUP 2011).

[2] See, notably, Matthew H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14 CJLJ 29 (2001); Tom L Beauchamp, *Rights Theory and Animal Rights* in Tom L Beauchamp and RG Fr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Ethics* (OUP 2011); William A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23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45 (2015); Gary L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first printed 1995, Temple UP 2007) 91ff; Steven M Wise, *Hardly a Revolution—The Eligibility of Nonhuman Animals for Dignity—Rights in a Liberal Democracy* 22 *Vt. L. Rev.* 793 (1998); Anne Peters, *Liberte, Egalite, Animalite: Human-Animal Comparisons in Law* 5 *TEL* 25 (2016); Thomas G Kelch,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and the Emotive in a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27 *BC Envtl. Aff. L. Rev.* 1 (1999).

[3] 法学界多以相当粗略和偶然的方式对待动物权利,因为它通常集中在与权利问题密切相关但被视为优先事项的平行辩论上。例如,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缺乏系统性的文章有很多,在根深蒂固的动物福利框架内,这些缺陷强化了对动物的法律保护向权利模式转变的呼声。法律学者的另一个焦点是将动物的法律地位从财产转变为人身,并以此作为权利主体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动物的法律权利可能是引发这些争论的最终目标,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对这种设想的动物法律权利本身给予详细关注。

[4] Joel Feinberg, *Social Philosophy*, 67 (Prentice-Hall 1973).

[5] See e. g. Alasdair Cochrane, *Animal Rights Without Liberation: Applied Ethics and Human Obligations* (Columbia UP 2012) 14-15, 207 (他对动物精神权利的描述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动物的法律权利); cf Joel Feinberg, *In Defence of Moral Rights*, 12 *OJLS* 149 (1992) (将这种间接引用法律权利的方式描述为“‘应该有一个法律的’道德权利理论”).

律严格的保护和执行机制有助于动物权利的保护。〔6〕考虑到动物权利的(潜在)法律化,我们应当重新研究并重构动物权利,而不是简单地将动物道德权利纳入法律领域。〔7〕

2. 动物法律权利开始出现在现行法律中,将其进行理论化的需求更加紧迫。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法院开始着手探索创造动物权利的司法途径,主要是通过动物福利立法中对权利的解释以及对宪法(人权)的动态解释等方式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最高法院从《防止虐待动物法》中衍生出一系列动物权利,并根据《宪法》进行解释,将这些法定权利提升为基本权利。〔8〕此外,阿根廷法院〔9〕和哥伦比亚法院〔10〕将人身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权扩大到了饲养动物行为。〔11〕这些(迄今为止孤立的)对动物权利的司法承认行为可以理解为动物法律权利的早期表现。在这一背景下,迫切需要动物法律权利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动物法律权利的发展。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系统化、细致化的动物法律权利理论。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以往采取零散、粗略的方式研究的相关主题,并将其整合为动物法律权利的总体框架。针对“动物权利”这一术语在使用中的模糊性、

〔6〕 正如法夫尔所言:“在个人道德或伦理不能充分保护动物免受人类虐待时,法律制度应当予以介入。”See David Favre, *Integrating Animal Interests into Our Legal System*, 10 *Animal Law Review* 87, 88 (2004).

〔7〕 即使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紧密相连 [see HLA Hart, *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 64 *Philosophical Review* 175, 177 (1955)], 之所以需要某种截然不同(或至少经过修改和完善)的理论,是因为动物法律权利主要由法律制度构成,与道德动物权利不同,其存在和范围必须根据所适用的法律规则来确定。正如怀斯所言:“哲学家讨论精神权利;法官决定法律权利。”See Steven M Wise, *Drawing the Line: Science and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34 (Perseus 2002).

〔8〕 Supreme Court of India 7 May 2014, civil appeal no 5387 of 2014 [27] [56] [62ff]; see further Kerala High Court 6 June 2000, AIR 2000 KER 340 (表达了“法律权利不应只属于人类”的意见, [13]); Delhi High Court 15 May 2015, CRL MC no 2051/2015 [3] [5] (承认鸟类“在空中飞行的基本权利”).

〔9〕 Tercer Juzgado de Garant as de Mendoza 3 November 2016, Expte Nro P-72. 254/15; this landmark decision was preceded by an *obiter dictum* in Camara Federal de Casacio n Penal Buenos Aires, 18 December 2014, SAJJ NV9953 [2] (表达了动物是权利主体并应被视为法律主体的观点).

〔10〕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26 July 2017, AHC4806-2017 (MP; Luis Armando Tolosa Villabona). 此裁决在2017年8月16日的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STL12651-2017 中被否定 (MP: Fernando Castillo Cadena)。2020年1月,哥伦比亚宪法法院裁定不向涉案动物授予人身保护令。

〔11〕 非人权组织向黑猩猩和大象发出的人身保护令尚未被美国法院承认。See *Tommy v. Lavery* NY App Div 4 December 2014, Case No. 518336.

不一致性和不可区分性等众所周知的问题,揭示动物法律权利不同层面的含义,使论证更加清晰。^[12]为此,文章分析确定了三组相关问题:其一,动物法律权利的性质和概念基础问题,笼统地说,动物是否可以享有法律权利;其二,与现行动物福利法有关的理论问题,即该法是否赋予了动物法律权利以及赋予了怎样的权利;其三,关于动物未来为什么以及在理想状态下应当享有什么样的法律权利这一规范性问题。本文将通过三个简单而关键的问题来回应动物能否、是否、应否享有法律权利?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动物享有法律权利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以及动物法律权利的形式结构和规范依据。如第三部分所述,不成文的动物权利可以从现有的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尽管这种“动物福利权”目前是不完善和弱小的法定权利。为了区分动物在实证法中所享有的弱小法律权利与在未来法律中应当享有的强大法律权利,本文引入了“简单动物权利”和“基本动物权利”这两个新名词。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根据未来法律动物享有强大基本权利的一系列原因。

二、动物能否享有法律权利?

我们首先要解决动物是否享有法律权利这一概念性问题,而无论事实上动物是否享有法律权利。动物是潜在的权利主体——法律权利可以赋予“概念上不合理”^[13]的生物——必须根据权利的一般性质来确定,这种权利的性质通常是权利的结构(或形式)和理由(或最终目的)。^[14]从一般权利理论的视角审视动物权利的概念,有助于确定动物法律权利的形式和依据,阐明动物法律权利的概念基础。本部分“(一)”集中讨论了基本权利概念上的两种特殊形式:权利和自由,并研究了它们与动物权利的结构相容性。“(二)”讨论了相

[12] See e. g. Will Kymlicka and Sue Donaldson, *Rights in Lori Gruen* (ed.), *Critical Terms for Anim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20 (2018); 在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使用“动物权利”这一笼统术语时,“权利”的含义通常不明确。例如,该术语既可以指动物精神上的权利或法律权利,也可以泛指两者。从广义上讲,“动物权利”有时是指对动物任何形式的保护,而从狭义上讲,它通常是特别重要和不可侵犯的类似于人权的动物权利而保留的。此外,有人认为“动物权利”是法律中已经存在的权利,而另一些人则在“宣言意义上”使用相同的术语来指代潜在的理想权利。

[13] Joel Feinberg, *Human Duties and Animal Rights in Clare Palmer* (ed.), *Animal Rights* (Routledge) 409 (2008);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29.

[14] See generally Alon Harel, *Theories of Rights*, in Martin P. Golding and William A. Edmundson (eds.),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Blackwell 2005), s191ff.

关权利的两种主要的相互冲突的理论,即意志论和利益论,和它们是否以及基于何种理由能够承认动物潜在的权利主体地位。

(一) 动物法律权利的结构

权利的形式结构通常是根据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来阐述的。^[15]著名的霍菲尔德指出,“权利”这一术语往往用来涵盖“任何种类的法律利益”,并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概念:主张(严格的权利)、自由、权力和豁免。^[16]下文将在一阶权利^[17](主张和自由)的基础上说明动物法律权利在结构上的可能性,以及此类法律关系的内容。^[18]

1. 动物请求权

严格意义上的权利是“享有对某物或某人提出请求的权利”,与客体对权

[15] 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3 Yale LJ 16(1913); 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6 Yale LJ 710(1917).

[16] See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n 15) 717; 霍菲尔德所述的这些基本权利仅仅是“原子”单位,许多共同权利是由其组合而成的复杂聚集体、簇或“分子权利”; Leif Wenar, *The Nature of Rights*, 33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23, 225, 234(2005).

[17] 一阶权利(主张和自由)直接关系到权利主体的实质性行为而非规范行为,而权力和豁免权则是涉及其他法律关系的二阶权利(“元权利”); 为了便于分析,优先考虑与动物行为有关的一阶权利,这并不是说二阶权利对动物一阶权利的伴随和支持并不重要。正如许多复杂的(如基本)权利包含豁免权一样,不受另一方(缺陷)改变豁免权人权利的法律权力限制,动物的权利主张和自由也可以得到豁免权的支持,这些豁免权保护这些一阶权利不被改变,甚至变得无效。例如,经常被提及的动物基本权利之一, the “right not to be property” [Gary L Francione, *Introduction to Animal Rights: Your Child or the Dog?* (first printed 2000, Temple UP 2007) 93ff], 可以解释为一种豁免权,它将剥夺目前与动物财产地位相关的合法处置权,从而使人类“所有者”无法决定动物的权利。作为被动权利,豁免权很容易被归纳为动物权利,因为它们是通过权利主体确定的,换言之,受动物的豁免权侵害的人在法律上不能这样做[see generally Matthew H Kramer, *Rights Without Trimmings*, in Matthew H Kramer, NE Simmonds and Hillel Steiner, *A Debate Over Rights: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OUP 1998) 22]。相比之下,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特定法律关系的控制权,它意味着一个人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规范能力[see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n 15) 55]。初步看来,权力似乎不适合动物。与被动的二阶权利(豁免)不同,权力是必须行使而不仅是享有的积极权利,与一阶积极权利(自由)不同的是,权力涉及法律行为的行使,而不是事实行动,因此需要法律而非仅仅是实际或代理行为。尽管如此,也有人认为,动物与儿童不同,可拥有通过人类代理人行使的法律权力(如强制执行权)(eg powers of enforcement) that are exercisable through human proxies [cf Visa AJ Kurki, *Legal Competence and Legal Power* in Mark McBride(ed.), *New Essays on the Nature of Rights* (Hart Publishing 2017) 46].

[18] See also Wise, *Hardly a Revolutio* (n 2) 799ff;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n 2) 96-7; Kelch,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n 2) 6ff.

利主体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义务相对应。^[19] 这类权利的形式是动物享有对某事物的主张,如承担相关义务的人或国家应当避免或应当采取某些行为。这种动物法律权利可以是不干涉的消极权利(与消极义务有关),也可以是提供帮助或服务的积极权利(与积极义务有关)。^[20] 请求权适用于动物,因为它是涉及他人(义务承担者)行为的被动权利,只是由权利主体享有而非行使。^[21] 请求权赋予动物一种纯粹的被动地位,明确规定了他人对动物负有的义务,不需要动物自身采取任何行动。

2. 动物自由

自由是涉及权利主体自身行为的积极权利。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自由,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自由,与另一人息息相关。^[22] 从表面上看,自由赋予动物权利。自由意味着动物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采取某些行为,即没有特定义务去做某些事情。反对者认为动物通常无力承担法律责任。^[23] 鉴于动物不可避免地处于“无义务”和“自由”的恒定状态,^[24] 自由对动物而言似乎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动物本身就存在于无义务的天然自由条件下。这种“天然自由”是一种赤裸裸的、完全不受他人干扰和保护的自由。^[25] 虽然动物可能享有“天然自由”,如在没有(没有能力有)不四处走动义务的前提下,任何人不得干涉动物的行动自由,如将它们捕获并关在笼子里。

将动物的“天然自由”转化为自由权利的价值在于,将不受保护的、赤裸裸的自由转变为受保护的既得自由,使其免受侵害。实际上,只有将“天然自由”纳入请求权和相关义务的“保护范围”内,才能将其视为法律权利,在这一保护

[19] See Joel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in Joel Feinberg, *Rights, Justice, and the Bounds of Liberty: Essays in Social Philosophy* 159 (Princeton UP 1980);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n 15) 55.

[20] 到目前为止,动物权利理论主要集中在消极权利上。See critically Donaldson and Kymlicka (n 1) 5ff, 49ff.

[21] Cf Wenar, *The Nature of Rights* (n 16) 233.

[22] See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n 15) 55; Kramer, *Rights Without Trimmings* (n 17) 10.

[23] See eg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162; but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41-2 (主张让动物承担法律责任并非不可能,尽管这“残酷甚至愚蠢”).

[24] “自由”是对“义务”的否定,因此可能被定义为“无义务”。

[25] 关于赤裸裸的自由和既得自由之间的区别,参见 HLA Hart, *Legal Rights*, in HL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Studies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172 (OUP 1982)。

范围内,自由可以得到有效行使。^[26] 这一“保护义务”包括一般义务(并非源于自由本身,而是源于其他请求权,如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不得采用“粗暴的干预方式”(如人身攻击或杀害,这排除了大多数干涉行为)等。^[27] 自由还可以通过严格的旨在保护特定自由的请求权和相关义务得以加强,如国家有(消极)义务不建立跨越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高速公路,或有(积极)义务为此类高速公路建立野生生物走廊,促进生活在这些零散栖息地中动物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3. 动物权利和义务:相关性和互惠性

关于动物权利义务关系的一些论述似乎是有道理的。一些学者认为动物不能享有法律权利,主要是基于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能力密不可分这一观点。^[28] 如果动物不能承担任何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就不能对其他动物享有法律(请求)权利,因为其无法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这是否剥夺了动物的法律权利,如对抗合法的人类或国家的权利?

虽然义务是(一阶)权利的主要组成部分,主张权利必然意味着他人承担法律义务,自由则说明权利主体不负有法律义务^[29],从逻辑上讲,两者都不必然意味着权利主体自己承担义务。克莱默指出:除非某人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享有权利,否则其享有的法律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而是要由其他人承担。^[30]

这强调了权利义务在概念和公理上的相关性(每项权利必然包含相应的义务)与权利义务互惠性(享有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承担义务的能力)之间的重要区别。相关性是指在同一个人法律关系中,不同主体权利义务之间的联系;互惠性则是指在独立的、逻辑上不相关的法律关系中,不同主体权利义务之间的规范性联系。

正如克莱默所言,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在逻辑上不相关的)承担义务的能力。霍菲尔德指出:这是“直接错误的”。^[31] —

[26] Hart, *Legal Rights* (n 25) 171, 173.

[27] Hart, *Legal Rights* (n 25) 171.

[28] See e. g. Richard L. Cupp, *Children, Chimps, and Rights: Arguments from “Marginal” Cases* 45 *Ariz St LJ* 1 (2013); see also Christine M. Korsgaard, *Fellow Creatures: Our Obligations to the Other Animals* 116ff.

[29] See David Lyons, *Rights, Claimants, and Beneficiaries*, 6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73, 173-4 (1969).

[30]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42.

[31]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42.

些规范性观点(特别是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主张权利主体应限定于那些在结构上是权利主体且能够相互作用的实体。换言之,它们是义务的承担者。^[32] 我们应当拒绝适用这种狭隘的契约式权利框架,因为它忽略了当前的法律现实。^[33] 针对法律上完全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如婴儿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现代法律制度切断了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之间的联系。^[34] 正如韦纳尔所言:“潜在权利主体的类别已经扩大到包括无义务实体。”^[35] 仅仅从动物不属于义务主体这一事实来推断它们不属于权利主体,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不恰当的。^[36]

(二) 动物享有法律权利的依据

尽管霍菲尔德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动物法律权利的形成,但凯尔奇指出:潜在动物权利的规范性依据仍然是不可知的。^[37] 在这方面,两种主要的权利理论对权利的最终目的以及享有权利的主体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38] 尽管动物权利的概念与意志论并不一致,但利益论可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1. 意志论

根据意志论,权利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和保护个人某些方面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法律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受法律尊重的选择”,而权利主体拥有“小规模控制权”,其权利主要是通过赋予他人义务的自由裁量的“法定控制权”的方式行使。^[39] 因此,潜在权利主体仅包括那些具有代理能力和法律地位的实

[32] In this vein, *Tommy v. Lavery* NY App Div 4 December 2014, Case No 518336, p 4, 6; but see critically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Tommy v. Lavery* and *Kiko v. Presti* decision of 8 May 2018, motion no 2018-268, concurring opinion Judge Fahey.

[33] 例如,哥伦比亚最高法院违反了这一权利框架,认为动物是权利主体而不是责任主体。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26 July 2017, AHC4806-2017(MP; Luis Armando Tolosa Villabona), 14ff; for a refutation of the contractarian reciprocity argument, see also Brief for Philosophers as Amici Curiae Supporting Petitioner - Appellant, *Nonhuman Rights Project v. Lavery* 2018 NY Slip Op 03309(2018) (Nos 162358/15 and 150149/16), 14ff.

[34] See Peters (n 2) 45-6; David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 The Legal Personhood and Dignity of Non-Human Animals* 25 SAJHR 38, 42-3(2009);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163; but see *Tommy v. Lavery* NY App Div 4 December 2014, Case No 518336, 5.

[35] Leif Wenar, *The Nature of Claim Rights* 123 Ethics 202, 207(2013).

[36]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43.

[37] See Kelch,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n 2) 9.

[38] For an overview, see generally Matthew H Kramer, NE Simmonds and Hillel Steiner, *A Debate Over Rights: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OUP 1998).

[39] Hart, *Legal Rights* (n 25) 183, 188-9.

体,排除了动物的权利主体资格,因为它们缺乏意志论中权利所必需的代理种类和程度。〔40〕

根据意志论,动物不是潜在的权利主体,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完全不能享有法律权利。意志论基于其权利主体〔41〕的类别及合理解释权利类型的包容性不足而受到批判,对权利概念的定义过于狭窄,无法为所有权利提供理论基础。〔42〕那些通常被视为动物权利的权利,往往是超过意志论解释力的权利,即不可剥夺的〔43〕、被动的〔44〕、保护动物(部分历史和社会因素)脆弱性的基本公法〔45〕权利。〔46〕这些权利应当在利益论的基础上加以解释。

2. 利益论

动物权利理论通常将动物权利置于动物利益的基础上,通常适用权利利益论。〔47〕根据利益论,权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增进权利主体某些方面的福利与利益。〔48〕法律权利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具有特殊的重要

〔40〕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30; Hart, *Legal Rights* (n 25) 185.

〔41〕 意志论认为,它在概念上不能作为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既不包括非人类,也不包括婴儿以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As noted by Hart, *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 (n 7) 181, the will conception of rights “should incline us not to extend to animals and babies... the notion of a right”; see also Kramer, *Rights Without Trimmings* (n 17) 69.

〔42〕 正如范·达菲尔所言,无论是意志论还是利益论,都不可能是一个“全面的权利理论”,都只是试图抓住不同类型权利的本质。See Siegfried van Duffel, *The Nature of Rights Debate Rests on a Mistake* 93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04, 105, 117 et passim (2012).

〔43〕 根据意志论,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概念上不是“权利”,因为它们排除了权利主体放弃相关义务的权利。See DN M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in PMS Hacker and J 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 Essays in Honour of HLA Hart* (OUP 1977) 198f; Kramer, *Rights Without Trimmings* (n 17) 73.

〔44〕 意志论主要以直接促进个人自主和选择的积极权利(自由和权利)为模式,对于不涉及权利主体个人自主和选择权的被动权利(主张和豁免)方面则不那么具有决定性。cf Harel (n 14) 194-5.

〔45〕 Hart, *Legal Rights* (n 25) 190. 其承认意志论不能对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作出充分分析;相比之下,动物法律权利被理解为主要针对国家的公法权利,国家负有相关的尊重和保护义务。

〔46〕 意志论将权利保护的目限定在人性的一个狭窄方面,即积极参与和自我决定的一面,而忽略了被动、脆弱和有需要的一面。自主无疑是值得规范保护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See Jeremy Waldron, *Introduction* in Jeremy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UP 1984) 11; M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n 43) 197, 208.

〔47〕 See Kelch,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n 2) 10ff; for an interest-based approach to animal rights, see eg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Cochrane (n 5) 19ff.

〔48〕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29; M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n 43) 192.

性。^[49] 利益论强调福利而不是服务,对动物权利的条件要求较低。对权利主体,利益论除了要求权利主体具备享有利益的能力外,并无其他条件限制。^[50] 根据“利益”的基本定义,利益的范围涵盖了所有动物、植物,甚至是一些无生命的物体,“享有利益”这一相当温和、潜在过度包容的概念标准通常由附加的、更加限定的“具有道德地位”的道德标准作为补充。^[51] 根据这一限定,利益相关者和那些享有工具性福利、内在的或“终极价值”的个体都能享有权利。^[52]

根据利益论,动物要成为潜在的权利主体,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动物必须有利益;其二,保护动物应当出于动物自身的利益,因为动物的福利本质上具有内在价值。目前,动物是否能够在享有权利的意义上享有利益,以及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或终极价值意义上的道德地位还有待研究。例如,有些人反对动物享有利益是基于对利益的理解这一观点,因为享有利益的前提是拥有复杂的认知能力(如具有信念和语言)。^[53] 大多数利益论者都倾向于从“为某人着想”的基础上理解利益,这意味着利益主体可以“变得更好或更坏”,并且能够从一些保护行为中受益。^[54] 一般而言,兴趣能力与感知能力(有意识和主观上痛苦、烦恼和快乐的感受)相关。^[55] 大多数利益论家都能接受(有意识的)动物作为潜在的权利主体,即作为享有法律权利的生物。^[56]

[49] J Raz, *Legal Rights* (1984) 4 OJLS 1, 12; Waldron, *Introduction* (n 46) 12, 14.

[50] See William A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2nd edn, CUP 2012) 97;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Clarendon Press 1986) 176;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167.

[51] See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33ff, 39.

[52]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n 50) 166, 177ff; see also Neil MacCormick, *Children's Rights: A Test- Case for Theories of Right* in Neil MacCormick, *Legal Right and Social Democracy: Essays in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UP 1982) 159-60.

[53] See RG Frey, *Interests and Rights: The Case Against Animals* (OUP 1980) 78ff; HJ McCloskey, *Rights* (1965) 15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15, 126; but see Tom Regan, *McCloskey on Why Animals Cannot Have Rights* (1976) 26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51.

[54] Harel (n 14) 195;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33.

[55] See e. g.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166;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39-40; Visa AJ Kurki, *Why Things Can Hold Rights: Reconceptualizing the Legal Person* in Visa AJ Kurki and Tomasz Pietrzykowski (eds.), *Legal Personhood: Anima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Unborn* (Springer 2017) 79-80.

[56] See e. g. Wenar, *The Nature of Claim Rights* (n 35) 207, 227;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54;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166.

出于法律目的,现代动物福利法坚定地保持(某些)动物内在利益价值的立场。现代动物福利立法除了承认其所保护的动物外,无法解释动物在道德和法律上的相关价值利益,特别是在福利、生命和身心完整方面。^[57]此外,它还取决于对这些动物(潜在或明确)的承认,即具有内在价值意义上的道德地位。现代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的、以道德为基础的动物保护法基本原理是保护动物作为动物而非工具的自身利益。^[58]有些法律甚至明确规定了动物的“尊严”和“内在价值”。^[59]

现有的动物福利法已经将动物视为具有某些法律利益和内在价值的权利主体,权利利益论者认为动物具备了享有权利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法律不仅在概念上承认潜在动物权利,还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动物法律权利。

三、动物享有(简单的)法律权利吗?

尽管动物在概念上可以享有法律权利,但学界的主要观点认为,就实体法而言,动物至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被承认的、可请求的权利。^[60]在英美法系

[57] See also Kurki, *Why Things Can Hold Rights* (n 55) 80.

[58] See Thomas G Kelch, *A Short History of (Mostly) Western Animal Law: Part II*, 19 *Animal Law Review* 347, 348ff (2013);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 (n 34) 44ff; 根据这一目的,南非宪法法院(2016年12月8日, CCT 1/16^[57])指出,“保护动物福利的基本原理已经从仅仅维护人类的道德地位转变为赋予动物作为个体的内在价值”(作为重点);德国根深蒂固的“ethischer Tierschutz”一词表达了动物福利法的这种非人类中心的伦理主旨。See Margot Michel, *Law and Animals: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European Anim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 Anne Peters, Saskia Stucki and Livia Boscardin (eds), *Animal Law: Reform or Revolution?* (Schulthess 2015) 91-2.

[59] 1999 Federal Constitution (Bundesverfassung) (CH), Article 120(2) and 2005 Animal Welfare Act (Tierschutzgesetz) (CH), Article 1 and 3(a); 2010 Animal Welfare Act (Tierschutzgesetz) (LI), Article 1; 2018 Animal Welfare Act (Loi sur la protection des animaux) (LU), Article 1; 1977 Experiments on Animals Act (Wet op de dierproeven) (NL), Article 1a;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 2010/63/EU of 22 September 2010 on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used for scientific purposes^[2010] OJ L276/33, Recital 12.

[60] See eg Steven M Wise, *Legal Rights for Nonhuman Animals: The Case for Chimpanzees and Bonobos* (1996) 2 *Animal Law Review* 179, 179; Richard A Epstein, *Animals as Objects, or Subjects, of Rights* in Cass R Sunstein and Martha C Nussbaum (eds.),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OUP 2005) 144ff;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n 2) 91ff; Kelch,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n 2) 18; Court of Appeal of Alberta, *Reece v. Edmonton (City)*, 2011 ABCA 238^[6]; *Herrmann v. Germany* App no 9300/07 (ECtHR, 26 June 2012),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Pinto de Albuquerque, 38; *Noah v Attorney General* HCJ 9232/01^[2002-2003] IsrLR 215, 225, 232, 253.

中,人们倾向于以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谈论“动物权利”,就好像它们已经存在于现行动物福利立法中。事实上,动物福利法很少赋予动物法律权利这一基本主张,因此关于现有动物权利的说法难以得到证实。下文将讨论动物的现有法律保护是否可以归类为法律权利?如果可以,将其归为何种权利?本部分“(一)”认为从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潜在动物权利(以下称为“动物福利权”)^[61],可以作为与明确的动物福利义务相关的内容,鉴于这种不成文的动物权利在实践中几乎得不到法律承认,目前为止,这一解读仍停留在理论中。“(二)”指出,从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权利是不完善和弱小的权利,不能为动物提供与法律权利相关的强有力的规范性保护,通常被当作制度化的动物道德权利。“(三)”引入了“简单动物权利”和“基本动物权利”两个概念,以区分并解释当前这种不完善的、弱小的动物权利与潜在的、理想的、强大的动物权利之间质的差异。

(一)从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动物福利权”

1. 相关性的简单论证

现有的动物福利法没有赋予动物权利特定的术语,也没有将任何明确的动物权利制定为法律。但它确实将保护动物的法律义务强加给人们,这些义务要求人们采取有利于动物福利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相关(请求)权赋予了动物作为此类义务的受益者地位。^[62]这种观点与利益论分析的逻辑结论是一致的。^[63]权利的本质是受法律保护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人利益,主张权利是“承担法律义务的规范性保护地位”。^[64]根据现有的动物福利法,动物

[61] 这类现行动物法律权利被称为“动物福利权”,表明其源于现行动物福利法。

[62] See eg Cass R Sunstein, *Standing for Animals (with Notes on Animal Rights)* 47 *UCLA Law Review* 1333 (2000) (claiming that current animal welfare law creates “a robust set of animal rights” or even “an incipient bill of rights for animals”. *ibid* 1334, 1336);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 (n 34) 43ff, 48-9 (concluding that “the existing statutory framework can already be seen to confer certain legal rights upon animals”; 50 fn 61); Jerrold Tannenbaum, *Animals and the Law: Property, Cruelty, Rights*, 62 *Social Research* 539, 581 (1995); Beauchamp (n 2) 207; Wise, *Hardly a Revolution* (n 2) 910ff; this view was endors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7 May 2014, civil appeal no 5387 of 2014 [27] (指出《防止虐待动物法》中“人类需要对动物负责的义务,这是一种强制性义务,因此需赋予动物相应的权利”。

[63] See eg Joel Feinberg, *Human Duties and Animal Rights* in Feinberg, *Rights, Justice, and the Bounds of Liberty* (n 19) 193-4 *et passim*; Kramer, *Do Animals and Dead People Have Legal Rights?* (n 2) 54; Wenar, *The Nature of Claim Rights* (n 35) 218, 220; Visa AJ Kurki, *A Theory of Legal Personhood* (OUP 2019) 62-5.

[64] Matthew H Kramer, *Legal and Moral Obligation* in Martin P Golding and William A Edmundson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188 (Blackwell 2005).

的某些价值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主要通过对他人强加义务的方式来保护。从现有动物福利义务到“动物福利权”的推论似乎依赖于某种程度上过于简单化的相关性概念,其思路是“有义务就有权利”。^[65]对动物福利法规中的受益义务可以为动物创造相应法律权利的观点,可以提出两种反对意见。

第一,并不是每一种义务都对应相应的权利。^[66]虽然某些义务不太具体,只有与某人(而不是仅针对某人)相关的指导性义务才是(主张)权利的因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从他人履行义务中获益的人都享有相关的权利。根据统一的权利义务界定标准,受益义务只在预期受益人中产生权利,即那些受益于旨在保护其利益的义务人。^[67]动物福利义务不是与动物相关的间接义务,如所有者对其动物的利益、情感或人类道德品质的保护,而是对受保护动物本身的直接义务。^[68]此外,现代动物福利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动物的自身利益。从一定程度上说,动物是动物福利义务的直接主要受益者。^[69]

第二,有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对动物权利的分析源于受益义务,这种分析基于一种权利概念,这种概念带有冗余的烙印。借鉴哈特的话:这似乎将权利仅仅看作是“义务的代替性表述”,因此“不过是义务的冗余翻译……转化为权利的术语”。^[70]麦考密克指出:对请求权的解释主要基于将权利视为逻辑上优先义务的“反射”。即当法律规定了一项旨在让个人受益的义务时,它们就存在。^[71]

解决这一冗余问题的方式是扭转权利和义务的逻辑顺序。权利并非简单

[65] 例如,桑斯坦认为关联性是双向的:“不仅仅是权利产生义务,义务也有助于权利的产生。”Cass R. Sunstein, *Rights and Their Critics*, 70 *Notre Dame L. Rev.* 727, 746 (1995).

[66] See also Kelch, *The Role of the Rational* (n 2) 8-9.

[67] See Lyons (n 29) 176; Waldron, *Introduction* (n 46) 10; critically Kramer, *Rights Without Trimmings* (n 17) 85ff; Visa AJKurki, *Rights, Harming and Wronging: A Restatement of the Interest Theory*, 38 *OJLS* 430, 436ff (2018).

[68] See eg Beauchamp (n 2) 207;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n 19) 161-2, 166;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 (n 34) 45-6; 在这一点上,德国高等法院认为,根据刑法关于必要性的正当理由(“rechertigender Notstand”),可以授权私人代表动物捍卫其受法律保护利益,即使这会损害动物所有者的利益。OLG Naumburg, judgment of 22 February 2018, case no 2 Rv 157/17, recital II; on why animals need directed rather than indirect duties, see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n 2) 350ff.

[69] See also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n 2) 100.

[70] Hart, *Legal Rights* (n 25) 181-2, 190.

[71] Ma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n 43) 199.

地由受益义务创造(虽然权利在逻辑上后于受益义务的产生)的,正好相反,这种义务是由(逻辑上先于受益义务的)权利衍生出来的。例如,拉兹指出:“权利是他人的义务之本”,因此优先于义务。^[72] 如果权利不仅被理解为相关性权利,还合理地优先于义务,那么将受益的动物福利义务确定为(逻辑上是后置的)动物权利则缺乏理论基础。为了适用权利是义务的基础这一观点,需要对上述论点进行重新研究和完善。

2. 相关性的限定论证

一个精辟、反向、来自相关性的论证必须证明,动物权利不仅是动物福利义务的反射,还是这种义务的依据。换言之,积极的动物福利义务应理解为:这些义务的产生是作为某种法律制定的反映,或是“潜在”背景下动物权利的体现。

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权利优先于义务这一概念。从表面上看,权利以某种方式先于义务的观念与霍菲尔德的相关性理论相悖,该理论认为权利义务之间存在相互牵连的关系,一方不能独立于另一方面而存在。^[73] 从这一角度看,权利义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为构成这些权利的义务与这些权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格沃思对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他用一个类比的方式说明了“在证明目的或最终因果关系的顺序上,请求权优先于义务并不违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在因果关系顺序中,父母先于子女,父母的(过去或现在)存在可以从子女的存在中推导过来;反之亦然。因此,父母对子女的因果优先权与这两个群体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有概念上的关联。这与权利和义务相类似,只是它们之间的顺序是最终的而不是有效的因果关系,是为了证明而非实现目的。^[74]

通过仔细检查,这一点可以得到进一步明确。以(生物学上的)^[75] 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为例:实际上“父母”的内容——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在某个时刻一起生育)——独立存在于可能出现的“孩子”之前,这时父母只在与“孩子”结合时才变成“父母”。“父母”和“孩子”的概念是相互融合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父母”,只有在“孩子”出现后才被称为“父母”,先前的内容是

[72]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n 50) 167, 170f; see also Alan Gewirth, *Introduction in Alan Gewirth, Human Rights: Essays on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4.

[73] See Kramer, *Rights Without Trimmings* (n 17) 40.

[74] Gewirth (n 72) 14.

[75] 为了论证观点,本文仅指亲生父母。

“孩子”的前因。

将其适用于权利义务问题时,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权利”的内容,并独立存在于“义务”之前,且(合理地)对“义务”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而“义务”又是“权利”的组成部分。“权利”及其内容与利益之间的区别在于,权利是保护既存利益的义务,而利益是权利的相关义务。因此,作为义务基础的不是权利,而是受保护的利益。这与拉兹对权利的定义相一致,根据该定义,“享有权利”是权利主体有权(她的利益)“要求其他人承担义务”。^[76] 现代动物福利法的制定证明:动物福利的某些方面(它们的利益)在时间和合理性上都具有因果关系,而且是对他人附加义务的充分理由。换言之,动物利益是动物福利义务的基础,也是动物权利的概念。

现有的动物福利法可以理解为包含不成文的“动物福利权”,作为将明确的动物福利义务强加给他人的潜在联结。赋予权利的法律规则,其基本特征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无论它们是否被明确规定。^[77] 为了使一项权利成为实质性(而非潜在或假定的)法律权利,至少应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即使不能主张或不能执行),^[78] 这是由适用的法律规则决定的。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律规范是否赋予动物不成文的权利就成了法律解释的问题。尽管学者可以证明,这种权利在法律的合理解释范围内,但一项实质有效的法律权利很难仅因为一些学者的讨论而存在。为此,某些公共权力机构(尤其是法院)对它的承认是有帮助的。虽然动物现有的法律保护可能规定了构成权利的全部要素,但需要法院通过权威性的法律解释将这些潜在权利转化为实质性权利。目前为止,除了少数例外,法院还没有这样做,因此,不成文的动物权利在实践中(尚未)得到法律承认,目前仍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论。^[79]

(二) 当下“动物福利权”的不足

除了法律承认问题外,还有许多实质性问题对从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权利是否属于真正的权利产生怀疑。目前的“动物福利权”是一种异常脆弱

[76]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n 50) 166, 180-1.

[77] See Ma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n 43) 191-2; Raz, *Legal Rights* (n 49) 13-14.

[78] 一些学者认为,法律权利仅在其拥有强制执行性时才存在。See eg 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P 2011) 405-6(指出法律权利是权利主体有权在直接可用的裁判程序中按强制执行的权力)。

[79] 在法律上承认动物权利的重大实质性障碍在于,几乎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动物都是法律客体而非法人。主流观点认为法人资格和享有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许多法学家都没有将现有的动物法律保护称为“权利”。See critically Kurki, *Why Things Can Hold Rights* (n 55) 71, 85-6.

的权利,无法提供与法律权利同等的强有力的规范性保护。^[80] 将现有的动物法律保护归类为“权利”与根深蒂固的观点相冲突,因为它们保护的是特别重要的利益,因此法律权利具有特殊的规范效力。^[81] 这种标准是用权利的潜在含义表现出来的,如“王牌”^[82]、“防护带”^[83]、“防护盾”、“禁止侵入”的标志^[84]或者“盔甲”。^[85] 权利赋予个人及其重要利益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以防止个人或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指出“不能为功利主义牺牲的利益”和“所促进或保护优于社会一般利益的利益”。^[86] 目前的“动物福利权”提供了一种非典型的弱小的法律保护模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们保护了次要利益;二是它们容易被否定。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从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权利,即第一类“动物福利权”方面着手。鉴于这些权利与现有动物福利义务有关,因此这些权利的实质内容必须反映各自法律规范中的内容。首先,这种归纳方法会产生一个“动物福利权”子集,该子集的实质性范围较小,主要保护特定的次要利益。例如,(相对)被宰杀的权利,^[87]以及一项涉及“未经麻醉不得造成严重伤害”^[88]或可以采用快速作用的方法杀死小鸡的(绝对)权利,如均质化或气化,且不得相互叠置。^[89] 如果将这些权利置于宽松的制度环境中,此时基本利益

[80] See generally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n 2) 91ff.

[81] On this, see Kai Moller, Proportionality and Rights Inflation in Grant Huscroft, Bradley W Miller and Gre goire Webber,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Rights, Justification, Reasoning* 166 (CUP 2014); Harel (n 14) 197ff; Waldron, *Introduction* (n 46) 14ff.

[82] Ronald Dworkin, *Rights as Trumps*’ in Waldron, *Theories of Rights* (n 46) 153.

[83] Bernard E Rollin, *The Legal and Moral Bases of Animal Rights* in HB Miller and WH Williams (eds.), *Ethics and Animals* (Humana Press) 106 (1983).

[84] See Tom Regan, *The Day May Come: Legal Rights for Animals*, 10 *Animal Law Review* 11, 15-16 (2004).

[85] Frederick Schauer, *A Comment on the Structure of Rights*, 27 *Ga L Rev* 415, 429 *et passim* (1993).

[86] Jeremy Waldron, *Rights in Conflict* in Jeremy Waldron, *Liberal Rights: Collected Papers 1981-1991* (CUP 1993) 209, 215-16 (emphasis added); see also Frederick Schauer, *Rights, Constitutions and the Perils of Panglossianism*, 38 *OJLS* 635, 637 (2018).

[87] Correlative to Council Regulation (EC) 1099/2009 of 24 September 2009 on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at the time of killing [2009] OJ L303/1, Article 4 and Annex I.

[88] Correlative to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 2010/63/EU of 22 September 2010 on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used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2010] OJ L276/33, Article 14(1)(2).

[89] Correlative to 2008 Animal Welfare Ordinance (Tierschutzverordnung) (CH), Article 178a(3).

将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权利的脆弱性和附属性将变得更加明显。^[90] 虽然这些权利可以保护某些次要的、衍生的利益(如以被无痛苦的方式损害的利益),但它们同时以损害更主要的利益(如不应被损害的利益)为前提。与最初法律允许的大量痛苦和杀戮并存,将动物切实得到的剩余法律保护表述为“权利”,一定程度上会对我们产生误导。^[91]

第二类“动物福利权”可以从一般动物福利条款中衍生出来,其范围更广,保护的是更为基本的主要利益,如幸福、生命权^[92]、尊严^[93]的权利免遭不必要的损害^[94]或免受酷刑和残忍对待。^[95] 虽然这类权利的客体具有更基本的性质,但其实质性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因侵权标准的降低而削弱。^[96] 换言之,这些权利缺乏规范性力量,表现在它们具有高度可侵犯性(对被否定的抵抗力较低)。大多数权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权利)都是相对的表面权利,可以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只有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必要性和相对性方面,才构成侵权。^[97] 认真对待权利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确保权利只为与所涉利益相称的重要因素牺牲。正如瓦尔德隆所言,权利被视为

[90] 以色列高等法院在强迫饲养鹅的案件中强调了动物福利法的宽容性。针对“有问题的”监管语言方面,法院指出,法律的目的是“防止鹅受苦”。显然,这些法律法规并不能防止,而是尽量减少所造成的痛苦。*Noah v Attorney General* (n 60) 234-5. See also Shai Lavi, ‘Humane Killing and the Ethics of the Secular: Regulating the Death Penalty, Euthanasia, and Animal Slaughter’, 4 UC Irvine Law Review 297, 321 (2014) (指出“解决疼痛和苦难的方式存在差异”,与不人道的行为并存,这些行为迄今为止没有受到挑战,且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91] *As McCormick, Children’s Rights* (n 52) 159, 指出:试想“火鸡有权得到良好喂养,以便在圣诞节餐桌上长胖”这种奇怪的逻辑,并不是在贬低现有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尽管与适当的法定权利相比,这些权利是弱小且不完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微不足道的。See, on this point, Regina Binder, *Animal Welfare Regulation: Shortcomings, Requirements, Perspectives* in Anne Peters, Saskia Stucki and Livia Boscardin (eds.), *Animal Law: Reform or Revolution?* (Schulthess 2015) 83.

[92] eg correlative to 1972 Animal Welfare Act (Tierschutzgesetz) (DE), § 1 and 17(1).

[93] eg correlative to 2005 Animal Welfare Act (Tierschutzgesetz) (CH), Article 1 and 26(1) (a).

[94] eg derived from Animal Welfare Act 2006 (UK), s 4.

[95] See eg Supreme Court of India 7 May 2014, civil appeal no 5387 of 2014 [62] (源于动物福利法,特别是生命权、享有食物和住所的权利、享有尊严的权利、享受公平待遇以及反对酷刑的权利); similarly, Court of Appeal of Alberta, *Reece v Edmonton (City)*, 2011 ABCA 238, dissenting opinion Justice Fraser [43].

[96] 例如,如果有充分正当的理由肯定了使用动物的任何工具性利益,那么免于不必要疼痛和苦难的表面权利将变得无效。

[97] See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n 2) 346; Harel (n 14) 198; Laurence H Tribe, *Ten Lessons Our Constitutional Experience Can Teach Us About the Puzzle of Animal Rights: The Work of Steven M Wise*, 7 Animal Law Review 1, 2 (2001).

用功利主义进行衡量的一种限制,即“重要的个人利益最终可能会与本质上不那么重要的因素相交融”。^[98]这恰恰是动物表面上受保护利益的情况,无论这些权利有多重要,都可能适用于功利主义,进而被相对不那么重要甚至微不足道的人类利益所牺牲,尤其是人类的饮食和时尚偏好、经济利益、娱乐或其他可以想象的人类利益。^[99]

当下动物所具有的任何“动物福利权”要么是次要的实质性、特殊性权利,要么是基本的表面权利,后者具有高度可侵犯性且“面临着消失”。^[100]问题是,这些特征能否使动物现有的法律保护非权利或弱小但仍然存在的权利。答案取决于特殊标准的力量、质量、影响在概念上是权利的组成部分还是典型特征。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某种规范力量作为标准,用以确定什么是权利,并取消那些结构上类似于权利但不符合法律保护标准的资格。^[101]第二种观点认为,将权利的规范力量作为一个变量,在从弱到强的范围内定义不同类型权利。^[102]为了说明在此标准上区分强有力的权利、弱小权利和非权利的复杂性,让我们回到与(生物学)“父母”的类比上。“父母”的概念本质上可以定义为“孩子的生物创造者”。通常情况下,养育者的特殊角色与“父母”的概念相关。就目前而言,仅仅满足最小概念标准(成为生物创造者)、没有概念上基本功能的人(不予照顾),仍然是“父母”吗?如果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是完整恰当的“父母”,还是不完美、坏的“父母”?也许当前的动物权利是“权利”,其意义类似于一个缺席的、疏忽大意、漠不关心的亲生父母,它不承担为人父母的角色和责任,仍然是“父母”。现行的动物法律主要保护符合权利最低限度的概念标准,但却没有发挥权利特有的规范功能。这些权利是一种典型的弱小和不完善的权利。

(三) 简单动物权利和基本动物权利的区别

如果人们认为动物现有的法律保护构成法律权利,换言之,尽管动物权利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承认,但动物福利法仍赋予动物法律权利,那么

[98] Waldron, *Rights in Conflict* (n 86) 209-11.

[99] See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n 2) 17ff, 109.

[100] Francione, *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 (n 2) 114.

[101] 绍尔认为,某种规范力量似乎是权利概念的组成部分,一项权利只有在其所保护的利益不受任何低层次因素侵害时才存在,如果该利益不受权利保护,这些低层次因素就可以对该权益进行限制。See Schauer, *A Comment on the Structure of Rights* (n 85) 430 *et passim*.

[102] 从这个角度来看,桑斯坦认为动物福利法“保护某种形式的动物权利,在权利或福利的概念中,不需要或多或少地保护相关利益”。See Sunstein, *Standing for Animals* (n 62) 1335.

从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的权利,无论多么弱小,都应具有权利特征;因此,必须对这种“动物福利权”的性质和限度作出限定。必须强调的是,这类动物法律权利没有达到以下条件:其一,法律权利是对重要利益的特别有力的保护;其二,将动物权利理论家设想的不可侵犯的基本动物道德权利(遵循人权原则)制度化。^[103] 因此,将动物在实证法中所享有的不完善、弱小的法律权利与其在未来法律中应当享有的理想^[104]、适当、强有力的基本权利分开是有必要的。

为了说明动物两种法律权利性质上的不同,本文结合了国际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个人权利的不同之处,^[105] 使用了“基本动物权利”和“简单动物权利”两个概念。在界定标准上,可以结合两个因素来区分简单动物权利和基本动物权利:其一,实体性(受保护利益的根本性或非根本性);其二,规范力量(侵权程度)。简单动物权利可以被定义为弱小的法律权利,其实质内容具有非根本性、辅助性以及基于高度可侵犯性而缺乏规范性的效力。动物基本权利是以人权原则为基础的强大法律权利,由于其可侵犯性降低,因此具有实质性、基础性、规范性和稳健性的特征。

动物福利权是由现行动物福利法衍生而来的。第一类“动物福利权”无论是否可侵犯都属于这一类,^[106] 而将第二类“动物福利权”归于此类的原因纯粹是基于其高度可侵犯性。然而,后者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能够在发生冲突时以强有力的方式处理。尽管第二类简单动物权利目前缺乏法律权利的规范效力,但它们确实可能成为基本动物权利。下一部分将探讨为什么动物需要这种基本权利。

四、动物应享有(基本的)法律权利吗?

在现有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上,动物享有不完善、弱小、简单的权利,但最后的规范性问题仍然是对未来法律的思考:动物是否应该享有强大的法律权利? 本文重点讨论动物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身体健康权、自由和免受酷刑的权

[103] See e. g. Donaldson and Kymlicka (n 1) 19ff.

[104] “理想权利”的含义“应该是一项积极权利,在更为理想的法律体系中也是如此。”Feinberg, *Social Philosophy* (n 4) 84.

[105] 在国内公法中,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与其他简单的公(如行政)法权利有所区别。同样,在国际法中,人权也可以与其他简单或普遍的国际个人权利区分开。See Anne Peters, *Beyond Human Rights: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in International Law* (CUP 2016) 436ff.

[106] 的确,实际上非基本的简单动物权利很难被否定,有时甚至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

利,因为这些权利与动物权利中“应当是法律权利”最为相符。鉴于权利术语的普遍性,在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存在总体上支持动物权利的呼吁就不足为奇了。^[107]然而,人们通常只是简单地设想,而没有去解释法律权利使动物受益以及加强对动物保护的原因。为了支持动物应该享有强大法律权利这一观点,下文将探讨动物需要这些权利的基本原因。^[108]通过一个非详尽的研究来讨论基本动物权利相对于动物目前的法律保护(无论是动物福利法还是“动物福利权”)的潜在法律优势和政治效用。

(一)程序方面:地位和可执行性

在当今公认的“执法差距”和“进退两难”的背景下,^[109]与动物法律权利相关或期望从动物权利中获得的实质性利益之一是促进动物自身的权益,为动物的法律保护提供有效的司法执行机制。^[110]法律权利通常包括具有起诉资格的程序要素、寻求补救的权利和使动物(由法定监护人代表)能够自行提起法律诉讼并主张自己的权利。^[111]这也将“分散”执法,即它不会集中在公共当局手中(并由其自行决定),而是以动物自身的地位要求强制执行。这一可执行性还可以通过将动物权利问题提交法院进行公开审判,从而促进法律的完善。

法律地位和可执行性是对动物权利有效法律保护的程序组成部分,应当注意的是,基本动物权利(任何动物法律权利)虽然有利,但对这一目的既无必要也无足轻重。一方面,并非所有法律权利(如某些社会经济人权)都必须强制执行。仅赋予动物法律权利本身并不能从程序上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基本动物权利必须包括某些程序性权利,如诉诸司法的权利,以便使这些权利得到有效落实。另一方面,授予动物或指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当今动物福利法

[107] 尽管如此,在动物保护运动中,法律权利的作用并非无可争议。关于动物权利实质性和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可参见 Kymlicka and Donaldson(n 12)325ff.

[108] See generally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n 2); Peters(n 2)46ff.

[109] 迄今为止,动物的法律保护因动物及其代理人法律地位的缺乏,普遍没有得到主管机关的落实。See e. g. Sunstein, *Standing for Animals*(n 62)1334ff; Tribe(n 97)3.

[110] The link between rights and the legal-operational advantage of standing was famously highlighted by Christopher D Stone,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 Toward Legal Rights for Natural Objects*, 45 S Cal. L. Rev. 450(1972); see further Cass R Sunstein, *Can Animals Sue?* in Cass R Sunstein and Martha C Nussbaum (eds.),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OUP 2005); Peters(n 2)47-8.

[111] See Stone(n 110)458ff; Tribe(n 97)3.

的辅助地位,有助于缩小执法差距。^[112] 然而,这仅仅提供了程序便利,即能够合法主张和有效执行动物所享有的特定法律保护,但与执行保护的实质内容无关。我们要大幅改善动物现有法律保护措施的执行力,因此单一的措施并不能替代强有力的实质性动物权利。动物需要强大的实质性、可执行的权利,主要通过基本权利和程序保障的结合来实现。

(二) 实质方面:加强对重要权利的法律保护

基本动物权利的功能本质上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实质性地改善和加强对重要动物利益的保护。基本动物权利将从三个层面加强对动物的法律保护:建立抽象的权利平等,扩大保护范围以包括更基本的实质性保障,以及加大侵权责任。

动物基本权利为公平竞争创造结构性先决条件,在这种环境中,人和动物的利益都能得到同等的保障,因此可以在平等条件下发生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承认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权利所给予的利益高于无条件的竞争利益。^[113] 目前,平衡人与动物间冲突的过程倾向于将人的利益凌驾于动物利益之上。人类的利益通常由强大的、基本的权利(如经济、宗教或财产权)支撑,而动物权利,如果受到法律保护,就会无条件地被纳入功利主义,仅仅受到动物福利法的简单保护,在冲突状态下迅速牺牲,无法与支撑人类利益的各种强权相提并论。^[114] 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平等,动物的权利必须获得与人类权利相匹配的强有力法律保护。基本动物权利应当纠正这种结构上的失衡,为权利平等创造条件,而不是一味偏袒人权。

动物基本权利既有实质性基础,又有规范性力量,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动物的法律保护。从实质性层面而言,动物的基本权利以动物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与简单动物权利相比,基本动物权利规定了对次要利益的实质性保障,扩大了利益的保护范围,涵盖了更广泛的基本利益和首要利益。目前损害动物基本利益的行为未被禁止,往往是因为这些利益最初未受到法律保

[112] See e. g.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South Africa 8 December 2016, CCT 1/16(明确了全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理事会享有在私人侵犯虐待动物罪时提起诉讼的权利)。

[113] See Frederick Schauer,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Question of Weight* in Grant Huscroft, Bradley W Miller and Gre goire Webber (eds.),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Rights, Justification, Reasoning* (CUP 2014) 177-8.

[114] See generally Saskia Stucki, *Grundrechte für Tiere* (Nomos 2016) 151ff.

护,^[115]久而久之便引发一种合理性要求,即平衡这些动物的基本利益。因为即使动物基本权利得到了保护,人与动物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尽管这是更高层面的抽象的权利冲突。因此需要引入某种平衡机制。^[116]

从合理性层面而言,动物基本权利需要一种特殊的、更为严格的侵权责任。^[117]实质上,具有高度可侵犯性的简单动物权利的特征之一在于,其合理侵权的门槛极低,且经常为次等甚至琐碎的人类利益牺牲。相比之下,动物基本权利的规范性力量取决于它们提高“最低限度充分正当理由的水平”的能力。^[118]根据基本的(人权)审判原则,模拟这些更为严格的正当理由,首先就限制了与基本动物权利相平衡的“合法目标”的各种因素。此外,平衡过程必须进行严格的相称性分析,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严格意义上的相称性等因素,将大量无关因素予以排除。^[119]合理侵权的门槛提高意味着动物基本权利的可侵犯性降低,增强了对动物表面权利的保护,使之不会在利益冲突和次要利益中牺牲。

总体而言,考虑到对动物权利法律保护的三个层面,动物基本权利将限制动物(满足人类利益)的可侵犯性和可处置性,使其免受目前法律尚未禁止的许多不必要的损害。

(三) 后备功能:权利在非理想社会中的作用

当代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动物,因此动物需要人类社会强有力的法律保护。^[120]法律权利作为强有力(但不是无法穿透)的后盾,为动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工具,保护个体的重要财产免受他人和整个政治团

[115] 例如,根据瑞士2005年颁布的《动物福利法》:生命本身并不是受法律保护的客体,因此(无痛苦、非任意地)杀害动物不需要任何理由。

[116] See also *Noah v. Attorney General*(n 60)253-4(指出平衡不同利益是“我们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117] See generally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n 2) 346; Sunstein, *Rights and Their Critics* (n 65) 736-7.

[118] 关于提高权利门槛的概念,参见 Schauer, *A Comment on the Structure of Rights* (n 85) 430;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P 1978) 191-2(指出,不能以“如果没有这一权利则可以最低限度代替为由”来否定一项权利)。

[119] 目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允许对绝大多数动物利益的干扰是必要或成比例的。See Francione, *Introduction to Animal Rights*(n 17)9,55.

[120] 正如特布纳所言,动物权利“建立了基本的保护机制。矛盾的是,他们将动物纳入人类社会,以抵御人类社会对动物的破坏趋势。” See Gunther Teubner, *Rights of Non-Humans? Electronic Agents and Animals as New Actors in Politics and Law*, 33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497, 521 (2006).

体的侵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权利是一种重要的反霸权主义制度,但其过于个人主义、对抗性等的框架也受到了批评。^[121] 在理想社会中,权利制度是否有其存在空间,这是有争议的,权利不是自然法令,而是人类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不断摸索出来的。^[122] 权利往往产生于不完善的社会条件,作为“未履行社会责任的回应”^[123] 和对不公正行为的纠正。正如德肖维茨所说:权利源于错误。^[124]

历史经验表明,在非理想的社会中,确实需要权利作为一个安全网,即“后备和安全的位置”^[125],以确保个人能得到最低程度的保护,这是其他强制性小的社会或道德机制无法给予的。

正如埃德蒙森所言,这种将权利作为后备保障的观点并不能完全反映动物对权利的需求。^[126] 该观点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运转良好的、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取代权利的整体社会结构。大多数动物并不是一开始就与人类保持关怀、亲密、仁慈的关系,而是剥削性、工具性和有害性的关系。对绝大多数动物而言,权利仅作为它们的后备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动物已经处于(或接近)底层。因此,对动物而言,权利的需要更为迫切,它们的功能不仅是补充,也是对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补偿,而目前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是缺乏的。^[127] 举一个(有些夸大的)例子:从批判法学者的角度看,他们从象牙塔的办公室里进行理论研究,认为在思想上摒弃抽象的权利似乎更容易,甚至是可取的,而对于一头因象牙而被猎杀的大象来说,具体的权利将产生生与死的区别。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动物需要一套基本权利,作为主要的“推动”而不是辅助性的

[121] See e. g. Mark Tushnet, *An Essay on Rights*, 62 Tex. L. Rev. 1363 (1984);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ee Press 1991); for a modern reformulation of the rights critique, see e. g. Robin L. West, *Tragic Rights: The Rights Critique in the Age of Obama*, 53 Wm & Mary L. Rev. 713 (2011).

[122] See generally Alan Dershowitz, *Rights from Wrongs: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 (Basic Books 2004) 59ff.

[123] Sunstein, *Rights and Their Critics* (n 65) 754.

[124] Dershowitz (n 122) 9.

[125] Jeremy Waldron, *When Justice Replaces Affection: The Need for Rights*, 11 Harv JL & Pub Pol'y 625, 629 (1988).

[126] See Edmundson, *Do Animals Need Rights?* (n 2) 358.

[127] 笼统地说,作为补充或补偿性担保权利的实质性需求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社会中的那些被剥夺权力、被剥夺权利、被边缘化、易受损害、脆弱、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压迫的社会群体而言则更为迫切。See generally Patricia J Williams, *Alchemical Notes: Reconstructing Ideals from Deconstructed Rights*, 22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401 (1987).

后备保障。换言之,动物需要一套作为补偿性的基本保障而非补充性的后备保障的基本权利。

(四) 转换功能:权利作为非理想现实与规范理想之间的“桥梁”

尽管动物需要基本权利,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使这些权利旨在建立和维护动物利益的最低标准,且目前而言似乎雄心勃勃,但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行。哪怕是对动物基本权利的基本保护,也需要大范围改变我们对动物的处理方式,而且最终可能会排除“几乎所有现有动物产业的做法”。^[128]

基于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人们对动物的工具性利用和伤害,以及虐待动物现象的普遍性,基本动物权利的含义与目前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129]规范性的目标与不完善的经验现实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动物基本权利所独有的问题;相反,基本权利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理想的和不可实现的,这是基本权利(人或动物)的本质。^[130]理想的权利表达了对理想的承诺,即使这些理想被正式承认,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它仍会持续不断地推动社会和法律的变革,使之朝着更广泛的方向发展。^[131]比尔奇兹将基本权利理解为道德理想,这给法律制度化和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并将其理解为促进迄今为止不完善的社会现实向更公正的社会过渡的“桥梁”。^[132]

这为研究动物基本权利的性质和变革功能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当下,仅仅通过对动物基本权利的承认,以及任何现实的措施,都不会立刻实现“废除剥削和将动物从奴役中解放”的最终目标。^[133]但它们确实为从非理想的现实走向更理想的社会条件创造了法律基础,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动物权利可以得到尊重。例如,一项强有力的动物生命权(至少在工业化社会中)会禁止大多数形式的捕杀食用动物的行为,这与根深蒂固的饮食习俗相冲突。尽管目前社会上食用动物的饮食习惯会使立即禁止肉类生产和消费变得不现实,但

[128] Donaldson and Kymlicka (n 1) 40, 49; see further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30ff, 348-9;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 (n 34) 69.

[129] See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 (n 34) 69.

[130] 关于人权诉求方面,参见 Philip Harvey, *Aspirational Law*, 52 *Buff L. Rev.* 701 (2004)。

[131] Philip Harvey, *Aspirational Law*, 52 *Buff L. Rev.* 717-18 (2004); Raz, *Legal Rights* (n 49) 14-15, 19; *Rights Are to Law What Conscious Commitments are to the Psyche*, Williams (n 127) 424.

[132] See David Bilchitz, *Fundamental Rights as Bridging Concepts; Straddl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Ideal Justice and an Imperfect Reality*, 40 *Hum Rts Q.* 119, 121ff (2018)。

[133] Donaldson and Kymlicka (n 1) 49; see also Gary L Francione, *Rain Without Thunder; The Ideology of the Animal Rights Movement* (Temple UP 2007) 2.

这也正是动物需要生命权(不被吃掉的权利)的原因,因为动物的基本权利有助于打破(先前)公认的社会习惯以及建立新的规范边界并将其内部化、习惯化。^[134] 基本权利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权利会产生一系列更为严格和广泛的义务。^[135] 比尔奇兹认为,“逐步实现”的既定概念(最初是在社会经济人权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能为逐步落实动物权利提供一个有益的法律框架。因此,每一项基本动物权利都可以被视为包括必须立即得到保障的最低限度核心、普遍禁止的倒退措施在内的逐步全面实现的义务。^[136] 即使动物的基本权利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将动物引入法律并将其作为规范性理想从而付诸实践的行为,相当于将动物置于“法律地图”^[137]上,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138]从中可以看到其朝着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的动态过程。

五、结论

动物权利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道德问题。近年来,动物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实现动物的法律权利已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重要目标。本文从引言出发,指出动物法律权利已经处于萌芽阶段,因为司法承认的动物权利开始出现在动物福利法和人权法中。随着动物法律权利的兴起,本文旨在系统地解决由此产生的概念性、理论性和规范性问题,为这一法律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动物法律权利的概念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现行法律中都有着坚实的基础。换言之,动物法律权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已经从现行的动物福利法中衍生出来。“动物福利权”作为一个实证法问题,并没有为动物提供强有力的规范性保护,这种保护通常与法律权利相关,动物法律权利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道德权利,许多学者也在期待这种保护。这种差异导致两种动物法律权利在概念上的区别:简单动物权利和基本动物权利。

虽然“动物权利”这一术语经常被笼统地指法律可能给予动物的广泛保

[134] Cf Kymlicka and Donaldson(n 12)331-2.

[135] 关于权利的动态性及其所产生的动力,参见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n 50)171; Waldron, *Rights in Conflict*(n 86)212,214。

[136] See David Bilchitz, *Does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Require the Recognition of Animal Rights?* 25 *Southern African Public Law* 267,291(2010)。

[137] Bilchitz, *Moving Beyond Arbitrariness*,(n 34)71.

[138] Cf Harvey(n 130)723(指出人权将永远是“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不是已经完成的项目”); similarly, Kymlicka and Donaldson(n 12)333.

护,但对简单动物权利和基本动物权利进行区分则有助于掌握现有动物福利法中的“动物法律权利”,它们是弱小的法定权利,也是在未来法律中动物应该享有的强大的基本法律权利。这一区分有助于进一步遏制动物权利术语的琐碎化,使我们能够将弱小的权利分离出来并归纳为其他的简单动物权利,以维护动物基本权利的规范性力量。最后,随着法院从动物福利法、宪法、基本法和人权法中衍生出来的动物法律权利,在新出现的判例法中可以得出首批简单和基本动物权利原型。克里斯托弗·斯通指出:“在整个法律史上,每一次新的实体权利的衍生都是不可思议的。”^[139]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下我们正在见证新一代的法律权利,即使动物权利成为简单和基本的权利。

[139] Stone(n 110)453.